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

鲁迅与现代中国文学者的选择

符杰祥 著

东方出版中心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

鲁迅与现代中国文学者的选择

符杰祥
著

東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鲁迅与现代中国文学者的选择/
符杰祥著.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09.3

ISBN 978-7-80186-967-8

I. 知… II. 符… III. 鲁迅(1881~1936)—关系—文艺思潮—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4771 号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鲁迅与现代中国文学者的选择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021-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敬民实业有限公司长阳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265 千

印 张: 10.25

插 页: 2

印 数: 0,001—2,250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186-967-8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言

时间在改变人亦在塑造人，人与人之关系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十年前，符杰祥考取我的研究生，他读我写的书；十年后，符杰祥获得博士学位成为特聘教授，我读他写的书。如果说我写的书多是“急就章”，那么杰祥写的书则是“十年磨一剑”，思想之锐利，史料之扎实，思辨之缜密，文笔之老到，令我惊喜与钦佩，充分印证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条古训。我并非有意抬高杰祥，此乃肺腑之言，这也是一代超越一代的进化规律使然；若是连这点自知之明也没有，我还有什么资格为人之师呢？若是连这种铁的事实也认不清，那怎样激励后起之秀去创造优于前人的现代学术文化呢？

杰祥的专著《知识与道德的纠葛：鲁迅与现代中国文学者的选择》所论的主题，虽然曾被不少学者从不同视角探索过，也见到一些不俗的学术成果；但由于该课题错综复杂而深邃幽眇的内涵，却为研究者提供了见仁见智的发掘与阐释空间。因而，学术功力越强，洞察思考越深，越能发现出一些他人未发现的新意，越能概括出一些新见，该书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这种创新趋优的特点。该书从切入视角上就显示出它的新颖性与独特性，从知识和道德纠葛缠绕的关系来反思现代中国的文艺运动与知识分子问题，在以往的相关著述中是不多见的。本书的可贵之处，不只是以整体思维突出地考察了知识分子的知识理性与人文道德在现代中国的缠绕纠葛和矛盾冲突问题，而且将知识与道德关系提升为一种方法论，既强调“道德高于知识”的学术原则，又强调“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并把历史书写视为一个永无休止的求知过程，而非一劳永逸的道德形象工程。正是

得力于这种独特视角的选择与方法论的相互为用,使得全书形成了这样的逻辑框架:以鲁迅与五四启蒙精神为聚焦点和连缀线,以知识理性与道德实践的纠葛缠绕为贯穿线索和考察重点,遵照历史时序选择不同区间的带有典型性的思潮运动与文学现象,点面结合,史论结合,既通过探察现代中国文学运动或文学现象来反思现代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与历史命运问题,又通过洞悉鲁迅在当代中国的境遇来反思我们时代的思想状态与知识界的精神演变。不论是宏观上的总体把握和系统考析,还是微观上的精细洞察和具体分析,都从富有思想威力的笔锋中透露出强烈的历史感与现实感;并从切实的感悟中,独特的发现中,深度的阐释和理性的概括中,闪现出理论与知识点的创新性,使人在获得新知的同时,也深受理性的启示。尽管我并不完全认同其观点或者我还有不同的思考,但思想的交流,不就是在一种异端的碰撞中发生的吗?我同时也希望,能以宽容的态度看待新的见解与意见,即使这新见还有其不圆满之处。

正是基于这种学术态度,我从杰祥的专著中感悟到一些创新点:一是在论述鲁迅弃医从文与文学态度发生的一章中,对将鲁迅的“弃医从文”视为启蒙规划的流行看法提出了反驳,指出弃医从文是鲁迅不断走向思想成熟的过程。鲁迅被称为“第一义的文学者”,不是因为他首先有了文学作品,而是因为他首先有了一种生命原理性的文学态度。进而指出,竹内好觉察到鲁迅文学存在着一种“生命原理”而没有说明的东西,就是“诚与爱”的文学态度。这种富有深度的阐述,是颇有新意的。二是在周作人一章中,对有些著述从思想问题上一味探寻“思想罪”的研究模式或思维习惯提出了质疑:如果作为一个思想者在思想上有种种超出常人或不同常人的想法那也成了问题,试问如何方可称作一个独立的思想者?如果作为一个思想者的行为出了问题都可以从思想中找到根据,那这样的思想者还能否成为活生生的思想主体,岂不是地地道道地受制于思想理念的机械工具?“沦陷时期的周作人尽管有种种道德丑行,但其富有启蒙意义与科学价值的道德学说未必就是其道德丑行的思想依据。恰恰相反,

周作人的问题不在于他的道德思想,而在于他未能履行自己的道德思想。”这是杰祥从反思“道德高于知识”的学术原则出发,对周作人的气节观念与气节问题以求知的态度所进行的检讨与认知,故其认为:“周作人的‘失节’不可否认,但并不意味着其气节观念的价值可以完全否认。在救亡的时代,周作人的气节观念显示了自己独特的理论思考与问题指向。如果说,同时代人是在以鼓吹气节的方式来抵抗日本的侵略,周作人则是以批判气节的方式揭露日本的危害。其态度是批判的,也是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救亡,也是为了启蒙。”对周作人附逆失节的研究及其所作的分析判断,虽然我不完全赞同,但是从其看似矛盾的论辩中却能发现杰祥没有把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力求寻找一种更切近历史本真的阐释。这种敢于探索新知、勇于打破常规的理论勇气,我深表赞赏。三是从左翼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青春文化品格与文本世界的内在矛盾切入,对左翼浪漫文人的悲剧命运进行反思,既有新意的发现又有深度的开掘,从颇具说服力的论证中做出这样的结论性概括:“以个性主义、自由主义为内核的浪漫精神是左翼浪漫文人走上政治的起点,也是他们陷入两难境地的基因,并由此导致了启蒙与革命的错位,个性与信仰的对立,诗学与政治的悖谬。”这样的概括精到而深刻,中肯而新颖。四是对“九叶”诗派的诗学理想与悲剧命运的洞察与透析,也不乏深刻睿智之见。如他指出,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的诗学理想悲剧在于其超前的先锋意义。其失败的诗学命运并不证明是诗人的理想错了,错的不是诗人的理想,而是理想所生存的年代。再如,对诗人穆旦以自我不断撕裂的受难者的写作方式,最终成为一个被苦难的血水所激醒的现代主义者的总体把握与深切剖解,都是从诗论、诗意、诗美的深刻感悟与独特体验中所获取的新见灼识。五是从鲁迅所遭遇的命运反观知识界精神状况的当代意识。该书或是从鲁迅的“病”与“死”来反思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或是从鲁迅的“纪念”文字来反思我们时代的“纪念”精神,这都是以强烈的当代问题意识来反观历史,以鲁迅精神来烛照现实,从而深入地思考当下时代的精神状态和知识分子所遭遇

的种种问题,把鲁迅命运问题提升到了一种时代认识的高度。特别是对鲁迅文中“记念”用意的阐释与当下时代“纪念”精神的别开生面的解读,纯属杰祥独具慧心的发现,这种扎实的比较研究既有雄辩的说服力,又映射出精细的治学态度。至于“余论”中提出的知识的“知识化”倾向与鲁迅式的“有机知识分子”在当代是否出现退场的严峻问题,道德形而上学方法论能否解决百年中国新文学道德与启蒙关系的问题,也同样发人深思。这也反映出杰祥关注当下问题的思考之深和忧虑之重,以及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所应有的独思与反思的品格。

再优秀的学术著作也是瑕瑜互见的,何况出自年轻学者之手的论著,可挑剔之处就更多了。我不想对该书的观点作什么商榷和质疑,应鼓励见仁见智的不同思想的交锋,允许发出各唱各调的不同声音,真正形成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只有这样,学术研究的繁荣创新庶几有望。我想说的是,杰祥在研究中追求一种片面的深刻,同时也希望他在辩证思考中能更稳健扎实!论述问题或解读文本多下一些探幽发微的细功夫诚然重要,缜密、反复的思辨也很重要,但“发微”和“思辨”倘能恰到好处,那就更好了。

阅读这部专著的同时,我不由得联想到杰祥其人。我一直认为,他是具有成为名学者的种种潜质的,也是富有梁启超所说的“真学者”的特征的。其一,他把老老实实在地做学问、孜孜不倦地求知识作为自己追求的价值目标。十年前,他与爱人辞去了工作,毅然决然地走上了考研求学之路,读完硕士考取博士,获得博士学位到大学执教从研,当下又在南京大学博士后流动站专心做学问。这十年来社会处在激变中,随着文化转型,人们的观念中钱与权占了突出地位,“学而优则仕”或“学而优则钱”成了多少年轻人追逐的目标。但杰祥似乎不受此风影响,其渴求知识、探询学问的痴心未改,总是在求学从研的学术道路上埋头苦钻,从没有过量的不切实际的妄想。每次给我的来信或电话中他从不谈“名、权、利”的问题,日常生活的问候之外,或是交流学术,或是批评现实,总是围绕学术与现实问题越谈越兴奋,越谈越慷慨。读书其乐无穷,做学问其乐无穷,似乎已成了我

们的同感。其二,好读书而求甚解,好思考而求新见,好质疑而求共识,好批判而不走极端,这是杰祥在治学上表现出的务实求真、怀疑追新的理性气质和科学态度。他并非出身书香门第而受过良好的家教,但有着一种贫家子弟发愤忘我的读书精神,寒暑假期间几乎没有回过家,其刻苦的态度在同学中是出了名的。该书的所有章节几乎都出自其有独特价值的学术论文,而每篇论文都是其读书之得,思考之悟,质疑之识,批判之果。其三,杰祥胸中有个化不开的启蒙情结,这既源于对鲁迅思想与人格精神的同气相求,又源于其内心固有的自由意识与独立思想,这使他具备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应具有的主体意识、自由意志与批判精神。从外表看,杰祥有点沉默寡言,忠厚老实,既不张张扬扬又不咄咄逼人,甚至还有点谦弱可欺的样子;实际上他心中有数,底气很足,凡事都有独立之见,并不人云亦云,随声附和。他好胜心强,从不轻易服输,也敢于坚持所是,骨头是硬的,忧国忧民,忧己忧生。这种性格作用于事业上或治学上,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敢于独立思考、敢于质疑权威、勇于坚持真理、勇于捍卫真理的胆识和气魄,该书的不少文字体现出了作者关注现实、关注启蒙的思想锋芒与人间情怀。其四,持有说真话、说实话、重证据、重思辨的学风。虽然当下知识界的学风有虚浮之气,但一向专心致志、苦读勤思的杰祥并没有受到“污染”。十年前读他的论文我可以感受到他敢于求真求实的思想勇气和有理有据的严谨学风;十年后读他的著作我同样可以体验到其思想的敏锐与学风的严谨。

杰祥已在学术园地耕耘了十年,且有了可喜的收获,这仅仅是他实现远大学术目标所迈出的第一步,来日方长,治学征程亦长,我相信他定能运用自己的综合优势去创造更优胜的学术业绩,决不会辜负老一辈学者的殷切期待。是为序。

朱德发

草于2008年国庆

目 录

序言	朱德发	1
引言		1
第一章 鲁迅留日时期的文学选择与文学态度的发生		13
一、1903—1907：鲁迅的“沉默”与“回心”		14
二、“弃医从文”：鲁迅思想成长中的“自觉”		19
三、“诚与爱”：鲁迅的文学态度与发生原理		25
第二章 左翼浪漫文人的青春理想与悲剧命运		33
一、左翼浪漫主义文学思潮：青春的激扬		35
（一）选择与张扬：浪漫精神的追溯		36
（二）青春时代：历史的呼唤		39
（三）青春人格：浪漫的回响		42
二、左翼浪漫主义文学世界：矛盾的追求		45
（一）矛盾的追求：个性与信仰的两难		45
（二）悖谬的选择：双重身份与两类文本		52
（三）火与梦：两重世界的交响		57
三、左翼浪漫主义文学命运：悲剧的归途		65
（一）三种观念：外部批评的问题		66
（二）三种根源：自身存在的问题		70

(三) 并非结语：鲁迅的震惊之外	74
第三章 周作人救亡时期的道德思想与启蒙悲剧	77
一、“为知识而求知识”：“纯粹的学问”与“真的科学精神”	78
二、反“气节的八股”：民族危机中的气节观念与道德批判	84
三、“文人不谈武”：救亡时期的“责任”与“主要的工作”	94
四、“思想革命尚未成功”：启蒙的位置与“凡人之悲哀”	108
第四章 内战时期的民主运动与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	122
一、民主的时代精神与“五四”回声	122
二、知识分子的“进言”热与心态变化	126
三、知识分子的学潮运动与组党热潮	130
四、《观察》与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	138
第五章 四十年代后期的“文艺政策”与“文艺运动”	143
一、1945 年的重庆文艺座谈会与《讲话》精神的传播	144
二、从《大众文艺丛刊》看 1948 年的“文艺运动”	153
三、文人清算与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	164
第六章 “九叶”诗派的诗学理想与命运浮沉	183
一、“在痛苦的挣扎里守候”：“九叶”诗派的分化与聚合	183
二、“新诗现代化”：袁可嘉的诗学理论与理想	194
三、“受难的形象”：穆旦的诗学气质与宿命	205
第七章 沈从文、张爱玲在新时期的“复活”与“神话”	220
一、“自己的文章”	221
二、“传奇不奇”	224
三、“意义即问题”	226

第八章 今天的鲁迅与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	230
一、鲁迅的“病”与“死”	230
(一) “病”与“死”之“谜”	231
(二) “活着”与“假如活着”	236
二、鲁迅的“记念”与我们时代的“纪念”	242
(一) 鲁迅的“记念”，我们的“纪念”	243
(二) 今天的鲁迅，“纪念”的传统	249
(三) “忘记我”，鲁迅无需“纪念”	254
 余论一 知识的“知识化”：鲁迅式的“有机知识分子”的退场？	259
 余论二 道德形而上主义：百年中国新文学的启蒙与道德关系论辩	266
(一) 必要的同情：道德形而上问题的意义理解与内在理路	267
(二) 需要澄清的困惑：道德形而上学的方法论能否解释启蒙问题	271
(三) 还需辨识的问题：启蒙问题是否可以归结为道德形而上主义	277
 附录 记贾植芳先生：一个同乡的回忆	281
 代跋：狂人的谱系学	张清华 284
 主要参考书目	300
 后记	308

引 言

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注意到,日本的“‘现代文学’正在走向末路,换句话说,赋予文学以深刻意义的时代就要过去了”。而在八十年代后的中国,逐渐摆脱了为政治服务的束缚的当代文学同样也“失去了昔日那种特权地位”。不过,似乎也没有必要为此惋惜,因为当“这个现代文学已经丧失了其否定性的破坏力量,成了国家钦定教科书中选定的教材,这无疑已是文学的僵尸了”^①。如果文学的“末路”是从这个方面说的,那就意味着文学本身不会走向消亡。一百年前,对于“不撖人心”的传统诗学早已失望的鲁迅在西方的摩罗诗人那里发现了诗歌具有一种反抗挑战、争天拒俗的精神力量,因而寄希望于“摩罗诗力”,“来破中国之萧条”^②。在此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也正是在一种质疑旧文学与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基调中确立了现代中国文学的新传统。在这样承载着启蒙使命与道德理想的变革语境中,中国新文学比之后来的文学,在道德理想方面显得更为自觉与沉重。

对于文学史,我喜欢把它作为精神史和心灵史来阅读,现代文学者的精神理路与命运遭际,也因此是我所关心的一个主要问题。我之所以愿意称这些人为“文学者”,而非“文学家”,并不是轻视他们的文学成就与地位,而是因为,他们从来都是我思考问题和精神游谈的对象,从来不是盖棺论定、形象僵硬的权威。与前现代的中国传统文人、后现代的当代作家相比,中国新文学者是一群身份、角色认同更

①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文版作者序,第1、3页,三联书店2003年版。

② 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10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为复杂,责任、使命意识更为强烈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仅从事文学活动,而且也不愿意仅仅以文学创作为满足,他们在写作之外,教书办报、走上街头、到民间去、组织社团、建立政党,与启蒙、革命、救亡等不同时代的文化思潮发生了种种冲撞,摩擦出了种种火花。在道术为天下裂的现代中国,他们赋予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一种强烈的道德使命感,一种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也因此,他们在各自的选择中,追寻着不同的文学理念,也遭遇了不同的人生命运。

在社会角色与责任意识上,知识分子无论是知识的创造者还是传播者,是道德的立法者还是阐释者,无论其思想信仰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之间又有怎样的分歧,知识与道德作为精神生活的一体两面,始终是他们关注的基本问题。从鲁迅在1908年提出“立人”主张,周作人在1918年提出“人的文学”以来,现代文学者的写作理念就一直闪耀着道德理想的光芒,而他们的文学创作就是一种道德理想的具体实践。尤其对自觉承担着思想启蒙使命的现代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不会满足于创造一种抽象的知识观念,而希望能够将自己的知识观念转化为一种普遍的道德实践。但实际上,文化传统的历史制约与社会语境的现实压力,使得知识分子在道德理想的实践之路上备尝苦难与艰辛,其知识理念与道德实践在现代中国也必然发生种种冲突与纠葛。鲁迅从留日时期就在呼唤中国的“摩罗诗人”与“精神界之战士”,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也回应了鲁迅孤独的呐喊。“五四”的最大成就,如林贤治所说,是造就了一大批以思想启蒙为使命的现代知识分子^①。这是一群在漆黑漫长的暗夜中开始独自觉醒、并试图唤醒其他沉睡者的人,一群饱受暴风雨的无情打击却始终在仰望星空的人,一群流浪于荒原之上却始终没有放弃行走的人。在现代中国,满怀知识分子道德理想的正是这样一群新生的人,所遭遇的也正是这样一种恶劣的环境。他们为此做出了自觉的选择,也为此判决了自己的命运。在权力的迫害中辗转流徙的鲁迅所

^① 林贤治:《五四之魂》,第2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描绘的那位走在茫茫荒原上的过客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普遍象征：听从心中的命令，却无法看到前途；但无论现实如何让人绝望，却依然心存向往。也因此，反抗绝望的现实体验让鲁迅真切地感受到了“真的知识阶级”在中国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在经历了清党运动的白色恐怖后，他在1927年发表演讲说，“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厉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①。这是一个坚持自由思想与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对于现实政治的敏感与自身命运的残酷预言。而鲁迅同时代的文学者及其后来者，以良知的坚持与命运的磨难，见证了鲁迅身后比预言更为残酷的现实。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是：不同立场的中国新文学者为什么会在不同时期、不同年代怀念曾经经历或未曾经历的“五四”，为什么都有一种化解不开的“五四”情结？而“五四”又为什么会成为张爱玲所说的一种“民族回忆”的东西，一种时间也无法湮没的“思想背景”？^②这大概是因为，“五四”被新文学者赋予了一种普遍而神圣的意义，对以“新青年”为象征的知识人来说，“五四”就是以自由思想、批判精神为基本价值的现代知识分子的降生日，是以民主观念、科学精神为基本内涵的现代思想的圣诞节。“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段极为短暂的历史，但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自由、个性最为解放的时期。它的历史是短命的，影响却是长久的。不论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来排斥它、改造它、扭曲它、篡改它，其所倡导与张扬的自由精神、人权意识、科学观念、民主思想都无法被遮蔽与掩盖。而所谓的爱国观念，如果缺乏独立、自由、民主、人道的现代思想基础，就会走向极权与奴役的反面，成为周氏兄弟在留日时期就极力驳斥的“兽性的爱国”。这一点，陈独秀在《新青年》时期的文章《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中也有过相当清楚的辨析，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

① 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第8卷，第190、191页。

② 张爱玲：《忆胡适之》，《张爱玲散文全编》，第309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这样的爱是具体的和理性的,不是抽象的和狂热的;是宽广的人类情怀,不是狭隘的族群利益。

“五四”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内心萦绕不已的共同情结,同时也还有着一种现实的追怀与受难意识。中国现代文学界并不缺乏优秀的思想者,只要有一点阳光,他们的思想同样会灿烂地绽放。可惜的是,他们生存的空气过于潮湿与阴暗。在有着几千年封建帝制传统的中国,权力在不断发生更迭,权力的专制性质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因此,思想可以自由争鸣的黄金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一个是先秦的诸子百家争鸣,一个就是“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它们的历史都很短暂,因为生长在权力斗争夹缝间的思想运动注定不会长久,一旦天下一统,王官之学恢复,自由思想就会被权力所绞杀,百家争鸣就会走向定于一尊。也因此,西方思想界在自由争鸣与持续批判中,出现了从柏拉图到康德、尼采、海德格尔的群星璀璨、大家辈出的景象,在中国则只有一位孔子配吃皇帝的冷猪肉,是只许一家独尊,不容二日并出的。不同朝代的中国历史有帝王、有领袖,唯独缺乏的是公民个人的自由权利。在西方的“公仆”意识来到中国之前,老百姓一直是将掌权者称为“父母官”而屈膝下跪的,其政治本质是康德所说的“像父亲那样的政府”。这个父亲即使摆弄“仁爱”之类的德治原则,也不能改变其“所能设想的最大专制”的性质^①。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知识分子是最为不幸的一群。他们经历着世界上最为漫长与黑暗的中世纪历史,虽然也创造出了灿烂的思想文化与文学经典,可那需要为正义与尊严付出怎样沉重的代价。从屈原的自沉汨罗,到司马迁的惨遭宫刑;从魏晋名士嵇康的广陵散绝,到明清两代的文字狱;从陈独秀“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的狱中赋诗,到后来反右运动、“文革”时期更大规模的思想冤狱……一部中国文学史,实际上也是一部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与受难史。早在二十世

^① 詹姆斯·施密特编:《启蒙运动与现代性·导言》,第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纪四十年代,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就预感到中国知识分子不太乐观的命运。他在1943年致柯里博士的信中说:中国知识分子“正在极其耐心地等待着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种百家争鸣、自由讲学的好时光的再次来临。事实上这种好时光可能永不再现了”^①。从这一方面说,知识分子怀念“五四”时代,是因为他们永远地失去了这个可以自由思想的时代,也是因为他们失乐园后仍然没有放弃告别中世纪的永恒梦想。

与“五四”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新文学者为什么会在不同时期、不同年代提到鲁迅,为什么会有学者把他称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话语基石”?^②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富有争议的人物之一,也是后来的历史无法绕过的人物。人们提及他,无论是认同还是不认同,是赞美还是污蔑,都要把他和“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挂起钩来,把他与左联时期的革命文学挂起钩来。他会成为革命文学首当其冲的祭旗对象,也会成为左翼文学首当一面的精神旗帜。他欣然遵从启蒙运动主将的命令,不惜为自己绝望的文学装点希望的花环;也坚决反对左联元帅、革命工头的话语霸权,即使他已经获得一种旗帜的尊奉与荣宠。无论是亲近还是疏远,是攻击还是拉拢,他似乎都永远是风暴的中心,都是最合乎不同需要的人物。他的思想贯穿了一个时代,也影响了一个时代。有争议的人物不是最完美的,却是最真实的。鲁迅扭曲的文字是那个扭曲时代的产物,用这扭曲的文字,他最大程度地挖掘出了时代的精神真相,最大限度地表达了自由思想的要求。即使在晚年屡屡受到宣传的欺骗,我们也能从那被骗的文字中感受到一种宁愿自己受骗,也不放弃人类理想的善良与真诚。他的文字至今还有人愿读,我想就在于其中有真实,也还有我们当代人实际的生活感受:“夜正长,路也正长。”竹内好说,在鲁迅那里,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线索”^③,对所有通过阅读鲁迅来阅读自己的人

① 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306页,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② 李新宇:《鲁迅的选择》,第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③ 竹内好:《近代的超克》,第190页,三联书店2005年版。

来说,这是一种普遍的内心感受。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另一个让人倍感沉重的问题是,除了个别善于变化的“聪明人”外,为什么坚守自己文学理想的知识分子所遭遇的都是一种悲剧命运?在他们之中,有坚持启蒙的独立思想者,有呼吁民主的激进思想者,有赞美革命理想的左翼文人,有将人性作为神庙的自由文人,却无一例外地以理想开始,以悲剧告终。鲁迅把中国历史看作是中国人做奴隶是否安稳的命运循环,周作人在中国的现实中常常感到一种历史“重来”的魅影,是有着自己深刻的现实体验的。在2007年的上海鲁迅纪念会上,有学者曾用割韭菜来形容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中国所遭遇的命运:用优秀的现代思想浇灌长大的一代代知识精英,为了民主自由的基本理念,一茬一茬地长大,一茬一茬地倒下,从再生长,再倒下,到再倒下,再生长……悲剧的循环,几乎成为现代知识分子无法摆脱的一种宿命。鲁迅在《醉眼中的朦胧》一文中将文人的思想交锋称为“纸战斗”,是一个形象的说法,也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纸老虎”的轻蔑比喻。是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表达离不开纸页,也是以纸页文字来发挥道德影响力的。在民主、法治、人权、自由意识完全真空的年代,他们的思想权利没有权杖可以保护,也没有刀枪可以依靠。在纸页上,他们拥有思想之内的力量;在纸页下,他们无法拥有思想之外的力量。尤其在迷信权力与尊崇正统的中国思想语境中,自由思想不会拥有真正的生存空间,知识不会得到真正的尊重,知识分子也不可能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鲁迅在1933年曾为自己的小说集《呐喊》题诗云:“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大约半个多世纪后,鲁迅的一位经历了政治运动灾难的青年朋友聂绀弩也留下了同样感慨万千的诗句:“多文为富更多情,心上英雄纸上兵。”寥寥数语,道尽了知识分子在希望与绝望间的无数艰难与辛酸。经历了《新青年》同人李大钊被军阀绞杀的事件与血腥恐怖的清党运动后,周作人从西哲帕斯卡尔那里借用的“思想的芦苇”的说法,是中国知识分子实际位置与命运的最好写照。王尧以“纸上的知识分子”来命名现代中国的知识分